
黃兆強先生訪問記錄

訪問：任鈺、張浩嘉 *

記錄：孫家怡、陶雨昕、汪昕玥 **

時間：2019年11月20日、12月11日

地點：臺北市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0614

黃兆強，1951年出生於香港。歷史學者，1979年畢業於香港新亞研究所，師從以下各名師：歷史學家計有嚴耕望、全漢昇、孫國棟¹、章群諸位先生，哲學家計有：唐君毅、牟宗三諸位先生，文史哲學家計有：徐復觀先生。留學法國期間，則師從以下各名師：國際漢學泰斗謝和耐

* 任鈺，鄭州大學歷史學院2017級，歷史學本科生，東吳大學2019年秋季交換生；張浩嘉，鄭州大學歷史學院2017級，歷史學本科生，東吳大學2019年秋季交換生。

** 孫家怡，鄭州大學歷史學院2017級，歷史學本科生，東吳大學2019年秋季交換生；陶雨昕，鄭州大學歷史學院2017級，歷史學本科生，東吳大學2019年秋季交換生；汪昕玥，鄭州大學歷史學院2017級，歷史學本科生，東吳大學2019年秋季交換生。

1 孫國棟，廣東番禺人。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哲學家，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與中文系主任及新亞書院文學院院長、香港新亞中學前校董會成員。〈孫國棟〉，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tw/孫國棟_\(教授\)](https://zh.m.wikipedia.org/zh-tw/孫國棟_(教授))。(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教授；此外尚有：桀溺教授、施舟人²教授等等。1987年，在法國巴黎大學獲博士學位。曾任東吳大學歷史學系主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錢穆故居執行長，中國歷史學會理事長等職。代表作有《廿二史劄記研究》、《清人元史學探研—清初至清中葉》、《學術與經世—唐君毅的歷史哲學及其終極關懷》、《章學誠研究述評 1920-1985》、《政治中當然有道德問題：徐復觀政治思想管窺》等。

生活愛好

家庭情況

1949年，父母親從廣州移民到香港。1951年，我在香港出生，是十個孩子中年齡最小的。我大姐在50年代回大陸建設新中國，因此我二十歲以前從未見過大姐。四哥六歲時在廣州番禺因病去世，這是我出生之前的事情。我三哥黃兆顯、五哥黃兆漢，在香港的學術界和藝術界都有一定的知名度。我和哥哥姐姐之間相處很好，他們都很照顧我。

20世紀50年代的香港還很落後，許多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謀生的人都找不到工作。我父親曾經做過一些小生意，但因經營困難，其後便關門大吉。父母親要養活九個孩子，生活艱難。

2 施舟人 (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 1934 —) 出生於瑞典，荷蘭血統，與顧彬、施寒微並稱“歐洲三大漢學家”，他精通八種語言，目前在福州大學擔任教授，並且任職福州大學世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施舟人〉，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施舟人>。（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我的夫人黃慧賢也是香港人，可是我在香港還不認識她，我們是在法國結識的。她家境不錯，父親是香港高級公務員，所以不為經濟問題發愁。夫人畢業於香港的一所私立大學，當時還叫書院，念的是社會系。畢業後，她在香港一所中學教了三年書，之後就前往法國進修。她是 1982 年年中去的，比我晚去兩年。

當時香港、臺灣或大陸同學去法國的不多，我們過年過節也常常聚會，弄些小吃或者一起餐敘。1982 年耶誕節的時候，我邀請了十多個同學來宿舍，她和朋友一起來玩，因此就認識了。

運動健身

我的愛好是跑步、爬山。以前我住在東吳大學，除了跟夫人去買菜以外，平常很少用車，因此我五十歲時才學開車。東吳附近有座山，我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跟夫人開車二十分鐘，把車停在路邊，然後走路上山鍛煉身體。如果早上沒有八點的課，我還會練十五到二十分鐘的氣功，再回學校上課或者辦公。

我學過很多種氣功，有太極十八式³、鶴翔莊⁴、智能氣功⁵、香

3 陳式太極拳十八式是由陳式太極拳第十九代掌門人陳正雷爲了推廣和普及陳式太極拳，將其濃縮精要創編而成，具有傳統陳氏太極的特點與精華，適合初學者學習。〈陳式太極拳〉，來源「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6%B0%8F%E5%A4%AA%E6%9E%81%E6%8B%B3/359628?fr=aladdin>。（點閱日期：2020 年 8 月 28 日）

4 鶴翔莊功是一種仿生功法，曾發佈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武林》雜誌，源於華佗「五禽戲」中鳥禽動作，詳見趙金香，《中國鶴翔莊氣功》（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5 智慧功指開發常態智慧與超常智慧的功法，詳見龐明，《智能動功功法普及教材》（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功⁶等。但我練氣功沒有恆心，常常練一兩個月就停下來。現在我常練的，我稱之為「懶人氣功」，就是身體直立，全身放鬆，氣會帶動你擺動身體，是一種自發功。說到太極拳，它發源于河南焦作陳家溝，後來陳式太極演變為楊家、吳家太極⁷。

2018年暑假期間，我搬離東吳，在學校裡面的活動就減少了。我六十歲以前多次參加東吳大學舉辦的超級馬拉松，後來由於年紀大了，便沒有再跑了。除此以外，我還會修理基本水電來打發時間。

學術研究

走上學術道路

我五哥黃兆漢是香港大學中文系一級榮譽畢業的高材生，他高中時就立下要當教授的志向，是一個自我期許比較高的人，而我比較隨遇而安。

我中學的成績中等偏上，大學成績還算不錯，以班級第一名

6 由於此功法修煉時芳香四溢，全稱「中國芳香智悟氣功」，簡稱香功。〈香功〉，來源「百度百科」：<https://baike.sm.cn/item/ea6d990c1ec744d0d5393a4adfc9a1a6.html?from=smsc>。（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7 太極拳發源於河南省焦作市溫縣陳家溝，由陳王廷潛心研究創編。清代中後期至民國，太極拳開始對外傳播，陳氏十四世陳長興首傳外姓弟子河北永年人楊露禪，逐漸衍變創編出「楊式太極拳」。清末，滿族人全佑師從楊家學楊式太極拳後，傳子吳鑒泉，創編出「吳式太極拳」。詳見於志鈞，《中國太極拳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的成績畢業。我大學就讀於香港浸會大學⁸，是浸信會創辦的基督教學府。1975年，大學畢業後在鄧鏡波學校⁹教中學，對面正好是新亞研究所¹⁰。因地利之便，於1976年考上新亞研究所，便展開邊教書邊讀書的生活。1979年碩士畢業，覺得自己學習程度還可以，產生出國留學的想法。但我並沒有馬上接著念博士，到1980年，也就是我教書滿五年之後，才申請出國，於9月底抵達法國。

我辭去教職去法國讀書，最初的目的是拿學位。留學初始各方面都比較困難，尤其是法文方面。香港除了中文和廣東話以外，就是英語為主，因此我不懂法語。當得悉被法國巴黎第七大學錄取後，我迅速惡補了半年法語，期間每週上一兩個小時的課，學不了多少，事實上法語程度很差，去了法國後又聾又啞，但一年之後，與人交流就基本沒問題了，於是正式開始學習課

-
- 8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簡稱「浸大」(HKBU)，位於香港九龍，其前身為香港浸信會聯會於1956年創辦的私立高等學府。〈香港浸會大學〉，來源「香港浸會大學官網」：<https://www.hkbu.edu.hk/eng/main/index.jsp>。(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 9 九龍鄧鏡波學校 (Tang King Po School, Kowloon) 於1953年創校，並以香港著名工業家及慈善家聖思物·德騎尉爵士鄧鏡波先生命名。1951年，香港政府以象徵式年租批出土地，指定用作興建一所非牟利學校。〈九龍鄧鏡波學校〉，來源「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93%E9%95%9C%E6%B3%A2%E5%AD%A6%E6%A0%A1/5158258?fr=aladdin>。(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 10 新亞研究所 (New Asia Institute of Advanced Chinese Studies)，創立於1953年，是錢穆、唐君毅、張懷介等學者繼創辦新亞書院後在香港創立的一所高等教育及研究機構，以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及中國哲學三大範疇為專攻領域。〈新亞研究所〉，來源「新亞研究所官方網站」：<https://newasia.org.hk/> 簡史 -2/。(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程。

原本我考上了美國加州的兩個大學，一個是伯克萊¹¹，另外一個是戴維斯¹²，都是美國名校。但是美國學校沒有獎學金，而法國政府給我獎學金，我又從未去過歐洲，因此想借此機會去遊學一年，再憑藉教書期間的積蓄去美國繼續念書。打定主意後，我馬上寫信給美國的大學申請延期一年，對方同意後，我啓程前往法國。可是去了以後就待下來了，沒有再去美國讀博士了。其實可能去美國對於我的發展前景會更好。因為美國是英語國家，用英語發表的論文被閱讀的機會更多，並且我英語程度要比法語好。我在巴黎念了六年半，於1987年3月初（我記得是3月5日）通過論文答辯，3月底返回香港。8月來到臺灣東吳大學教書，當時我已經三十六歲了，到2019年夏，已經教書滿三十二年。離開法國三十多幾年了，現在用法語日常溝通沒太大問題，但要寫比較流暢的法文還是有困難的。

我的學術之路，基本上是隨遇而安，沒有立下一個很高的志

11 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簡稱伯克萊，位於美國舊山灣區伯克萊市，是世界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學、在學術界享有盛譽，是世界最頂尖公立大學之一，環太平洋大學聯盟和國際公立大學論壇成員。〈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來源「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官網」：<https://www.berkeley.edu/>。（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12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簡稱UCD、UC Davis 或 Davis，是設立在美國加州的戴維斯，位於薩克拉門托西部的一所世界頂尖的研究型大學，隸屬於著名的加州大學系統，是北美頂尖大學聯盟美國大學協會、環太平洋大學聯盟和國際公立大學論壇成員。該校被譽為「公立常春藤」盟校，屬於Tier-1（最高級別）全美最頂尖公立大學之一。〈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來源「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官網」：<https://www.ucdavis.edu/>。（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向，考上了就繼續讀，考不上也許就去工作了。我大學畢業後就在中學教書了，當時年輕的我還有一點使命感，想為社會做一些事情，可是我念的專業和社工不相合，後來也沒有從事社工，逐漸完全從事教學和學術的工作。

結緣史學史

我在讀碩士的時候就決定要研究史學史。在研究所時，我主要針對趙翼的《二十二史劄記》做研究，他的書是清代乾嘉史學三大名著之一，後來我的論文題目是〈趙翼史學研究〉。在法國求學期間我對章學誠十分感興趣。當時余英時¹³寫過一篇文章叫〈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比較了英國史學家柯林烏(R.G.Collingwood)¹⁴與章學誠的史學思想，我一開始也想用柯林烏和章學誠的比較研究作為課題。

然而，我的導師國際漢學界泰斗謝和耐(Jacques Gernet)¹⁵教

13 余英時(1930-)，中研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余英時著作良多、桃李滿天下，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包括古代中國反智論、得君行道、內向超越與外在超越、軸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論，影響半世紀的全球漢學研究。〈余英時〉，來源「中央研究院」：<https://academician.sinica.edu.tw/index.php?r=academician-n%2Fshow&id=16>。(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14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FBA (1889–1943) was an English philosopher, historian and archaeologist. He is best known for his philosophical works, including *The Principles of Art* (1938) and the posthumously published *The Idea of History* (1946).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來源「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llingwood/>。(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15 謝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2018)，法國漢學家，法蘭西文學院院士，法蘭西學會教授。主要研究中國社會和文化史，著作頗豐，被譯成多國

授對比較史學沒有興趣。他和我說：「不要做什麼比較史學了，你乾脆做章學誠研究好了。」可他又有點遲疑，因為他知道著名美國學者大衛·倪德衛 (David S. Nivison)¹⁶ 寫過《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ueh Cheng)。他說：「你可以研究章學誠，但不要做比較研究，這本書(《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寫得很好，你的研究會超過他嗎？某方面會有所突破嗎？如果沒有突破，沒有新的 Idea，恐怕很難做這個研究。」

所以他建議我：第一，不要做章學誠和柯林烏的比較研究。第二，也不需要針對章學誠做研究，他認為《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寫得很好，我再研究也不見得超過 David S. Nivison，這樣做博士論文的意義就不大了。我是 1980 年去法國的，那時章學誠已經去世近兩百年了，導師覺得有很多人研究過章學誠，所以他給我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角度：「可以對於別人的研究成果做一個整理、研究、分析、批判、消化等。」從我們今天的角度來講，就是從文獻學史、史學發展史的角度研究章學誠。

文字出版。曾獲得法國榮譽軍團高等騎士勳章、儒蓮獎、翟理斯獎等榮譽。其父路易·熱爾內 (Louis Gernet, 1882—1962) 是古希臘研究專家，擔任過法國文學院院長一職。〈謝和耐〉，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cn/%E8%B0%A2%E5%92%8C%E8%80%90>。(點閱日期：2020 年 8 月 28 日)

- 16 大衛·倪德衛 (David S. Nivison, 1923-2014) 美國斯坦福大學榮休教授。1953 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長期任教斯坦福大學，教授中西哲學和古代漢語，對中國古代思想史、西周系年有著深入的研究。代表作有《行動中的儒教》(Confucianism in Action)、《章學誠 (1738-1801) 的生平與思想》(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ueh Cheng) 等。〈大衛·倪德衛〉，來源「philosophytalk」：<https://www.philosophytalk.org/blog/obituary-stanford-professor-emeritus-david-s-nivison>。(點閱日期：2020 年 8 月 28 日)

導師告訴我要運用我的語言能力，從中英法不同語言的研究成果來看別人的研究成績，通過閱讀各種語言寫成的著作，進行史學史研究或他人研究成果的整理、比較研究等等。于是我採納了導師建議的方法和路徑，將中英法日和一兩篇德文的研究成果作為我研究的對象。我的博士論文也以此為主題寫成。

中文、英文、法文對我來說都不成問題，但還有不少是用日文寫的文章。最早是內藤湖南¹⁷寫的章學誠年譜，後來胡適也寫過《章實齋先生年譜》，胡適寫這本書就是受到內藤先生的刺激，「章學誠名氣這麼大，但第一個對他做正式科學研究的居然是一個日本人」。所以胡適大概有點不甘。由此可見，近現代開始對章學誠做所謂符合現代標準的研究是從日本人開始的，內藤湖南後研究章學誠的日本人更多了，因此這些論文我不得不看。我在香港學過一年日文，剛去法國時，離開讀日文的階段就只有兩三年，所以勉強看懂一點，現在完全不行了，連五十音都認不全。而且一百年前的日本人，他們寫日文大部分還參雜很多漢語，我就一半靠猜，一半靠自己學過一年的功力，真的完全看不懂的地方就請教一下別人，也勉強把日文文章作為研究對象。但還有一兩篇為德文所寫，可我完全不懂德文，便請教一個懂德文的香港同學，請他幫我把重點寫出來。

研究時看法文不成問題，但寫卻十分困難。我寫第一章時先

17 內藤湖南(1866-1934)，日本近代中國學的重要學者，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創始人之一。內藤湖南側重中國本位之學，在中國史宏觀方面有空間上的「文化中心移動說」和時間上的「唐宋變革說」兩大見解。〈內藤湖南〉，來源「近代日本人的肖像」：<https://www.ndl.go.jp/portrait/datas/301.html?cat=18>。(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寫中文，後來再將中文翻譯成法文，但工作量太大了，後來就直接用法文寫，幸好當時有一九七九年大陸出版的《法漢詞典》，基本上解決了我寫作和翻譯的問題。

我寫完以後又請人幫忙修改。最先請了一位曾在中學教法文的退休教師，我用法文跟她解釋後，她便幫我修改為比較通順的法文。可是她完全不懂中文，年紀也大了，修改工作很難進行下去。後來看她太辛苦，不想再麻煩她，就另請別的朋友幫忙。所以我只能邊改邊寫，邊寫邊改。前後大概請了五六個法國朋友幫忙，他們都很熱心，可惜都不懂中文。導師 Gernet 教授在法文方面也幫我修改一部分。我終身感念的另一位老師是著名漢學家桀溺教授 (Professor Jean-Pierre Diény)，他幫我修改了數十頁。還有一位漢學家，他也幫忙修改了一部分。雖然謝和耐先生是我的導師，但他非常繁忙，一方面堅持做研究，另一方面他也是法蘭西學院某單位的主管。所以我的論文，他除了給我提幾點意見外，從頭到尾都是我獨力承擔。因此，我十分感謝桀溺教授。他不是我的論文導師，只是給我上課的老師而已，可他給我改動的地方和提的意見，我都覺得獲益匪淺。如今這兩位老師都已經去世了，謝和耐導師是 2018 年去世的，他很高壽，活到了 98 歲。

論文寫成並通過答辯後，我不敢發表，也沒有能力發表，先不說內容的好壞，至少法文一定不好，那怎敢發表呢？若發表，豈不貽笑大方！當然如果經濟能力好的話，有的同學會出錢請別人修改，我是沒有這個能力，只是請朋友幫忙修改。但沒有任何朋友有時間和興趣會把幾百頁的論文幫你從頭改到尾的。五六個朋友幫忙修改的結果必然是行文的風格、語調都很不一致。

論文答辯的時候，系主任說：「你法文不好。」當然其他考

委也知道外國學生法文不好是一定的，可他們還是給我打了很高的分數。也許是覺得內容還不錯，也許同情我是外國人吧。當時的答辯真的很嚴，如果以法國人的法文水平來要求，我恐怕沒有辦法畢業。我的導師名氣大，所以其他考委可能是賣他面子，後來我是以最優等（très honorable）的成績畢業。

法國的漢學（Sinology）研究分成兩個主流，當時的主流還是伯希和（Paul Pelliot）¹⁸ 或者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¹⁹ 的傳統漢學，就是研究中國古代史，即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史，另外是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二戰期間及戰後，尤其是戰後到 20 世紀 70 年代，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國古代史，即以傳統漢學為主；後來重點慢慢有所轉移，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漸漸成爲主流，相對來說古代史的研究開始式微。我的研究選題與傳統法國漢學界接軌，算是接近傳統主流吧。

史學史研究方法

第一序 First order 的研究是針對歷史發展本身做研究；對史書進行研究，我們則稱爲第二序 Second order 的研究。歷史發展

18 保羅·歐仁·佩利奧（Paul Pelliot, 1878-1945），漢名伯希和，法國語言學家、漢學家、探險家。1908 年前往中國敦煌石窟探險，購買大批敦煌文物運往法國，今藏法國國家圖書館老館。伯希和精通各國語言。〈保羅·歐仁·佩利奧〉，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mo/%E4%BC%AF%E5%B8%8C%E5%92%8C?oldformat=true>。（點閱日期：2020 年 8 月 28 日）

19 保羅·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法國漢學家，敦煌學著名研究學者。〈保羅·戴密微〉，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cn/%E4%BF%9D%E7%BD%97%C2%B7%E6%88%B4%E5%AF%86%E5%BE%AE>。（點閱日期：2020 年 8 月 28 日）

的過程如何被寫成史書或文章，這些寫書的人用什麼樣的史學思想以及什麼樣的緣由和寫作的方法及框架、架構來記敘或重建歷史的過往，怎樣把重建的結果寫成書或是文章，我對於這些方面的興趣大於對歷史本身發展的興趣。廣義來說，史學史也算是思想史的研究，所以也可以說我對於思想史研究的興趣更勝於對歷史本身發展的研究的興趣。

我碩士論文內容與趙翼史學有關，主要處理《廿二史劄記》一書，該書共十章，我選擇其中三章獨立出來再加以擴充就寫成《廿二史劄記研究》這本書。《廿二史劄記》到底是不是趙翼所寫，我對這個問題也蠻有興趣。前輩杜維運先生早就研究過這個問題，我覺得處理得很不錯，但是若干問題還是處理得不太周延，還有可以補充的地方，所以對於這一問題我又進行一些補充研究。《廿二史劄記》一書中有一個很短的序文，趙翼稱之為「小引」，序文裡提到趙翼在考證時是根據正史裡面的不同篇章進行對照，假定發現某個地方有問題，他就單純利用正史的不同部分進行補充或修正，而不是用正史以外的史書。

譬如把《史記》裡的本紀跟列傳互相對照、對勘。《史記》中〈高祖本紀〉和〈項羽本紀〉都講到兩軍作戰的情況，如果〈高祖本紀〉裡有講的不清楚的、不完整的或者是因為經過兩千多年來有傳抄錯的地方，可以利用〈項羽本紀〉來進行補充改正。反過來也是，〈項羽本紀〉裡有問題的也可以參照〈高祖本紀〉進行比較，採用更正確的說法進行補充與改正，這就是趙翼所說的利用本書的不同地方來相互參照、互相矯正。實際上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也引用過不少正史以外的書，即博徵正史以外的典籍。換句話說，趙翼是大史學家，但他所說的話，也不能照單全收。

這一點需要我們特別注意，不能盲目相信權威。

無論是做史學史研究也好，其他歷史研究也好，最重要的是要看一手材料。看原始材料是做研究的一個通則，做歷史研究不利用原始或一手材料的話，做出來的成果常常會受到別人的質疑。不看原始資料當然不行，但光看原始材料也不夠，還需要看二手的研究成果。如果寫碩士論文或者碩士論文以上這樣比較嚴謹的學術著作，要參考一手材料，也要看二手的研究成果。比如說要做有關趙翼《廿二史劄記》的研究，那麼除了原書之外，還要看包括杜維運、我，和其他人關於趙翼的研究，這樣做的研究才比較完整。看二手材料能使你從中得到一定的啓發。比如這個問題處理的蠻好的，那我就不要再做了，或者某些問題儘管處理過，可處理得不完整甚至有錯誤，在這個地方我就有發揮的空間等等。總的來說，不看一手只看二手不踏實，而只看一手不看二手，就容易重複研究，所以這兩個取徑（approach）都很重要。

對於現在做歷史研究的人，無論是做史學史研究還是做針對歷史本身的研究者來說，看一手材料和二手材料是很基本的事。我的老師嚴耕望²⁰曾經講過：走路必須兩條腿，一條腿走路的話，儘管能走，可是不平穩，必須兩條腿走路才平穩。同理，做歷史研究就好比人走路，一手材料二手材料都要兼顧到，兩條腿

20 嚴耕望（1916-1996），歷史學家，專治中國中古政治制度和歷史地理，以治學方法嚴謹聞名。嚴耕望的研究基於龐大的原始文獻和細密的考證，他還窮畢生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認為這方面是「尤重國計民生之大端」。嚴耕望在學術界有普遍的高度評價，余英時在悼念他的文章中稱他為「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嚴耕望〉，來源「中央研究院」：<https://academicians.sinica.edu.tw/index.php?r=academician-n%2Fshow&id=338>。（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並用才能平穩。否則，儘管能夠走卻總是有問題。史學史研究有它的特點，必須要針對人家的研究成果做研究。就是要設身處地地瞭解研究者，他到底採用什麼樣的方式方法，背後有什麼思想架構或者指導思想等等去做研究。史學史研究必須要瞭解史家或研究者的思想，才能夠瞭解他的研究成就在哪裡。

每一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不同的個性的人所適合的研究也不同。如嚴耕望老師對思想史不感興趣，也許他覺得思想史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說法，很難有一個客觀、公正的研究成果。對他來說研究政治制度是比較踏實的做法，除非研究過程裡面有漏洞或者資料蒐集得不完整，否則研究成果很難被推翻。所以嚴耕望老師對於一板一眼的研究很在行，就適合去做一些考證的、踏實的研究。又如章學誠，他重視義理，就比較適合做史學史或者思想史研究。所以我常跟同學們講，必須要量才適性，衡量自己的才幹，找一個符合自己性向的研究領域。這樣進行研究，才容易有成果。要不然，一方面會研究得很痛苦，另一方面雖然最後能夠做出成果，但恐怕不會很顯著。所以必須要有自知之明，瞭解自己的個性再去做研究，才能夠獲得比較高的成就。

譬如我的《清人元史學探研》²¹是研究清代人怎樣研究元史的，裡面講了六個在元史研究方面有杰出成就的清代人物。比如說乾嘉三大歷史考證學家之一錢大昕，他在對二十二史進行考異時，其中有一部分是針對《元史》進行考證。元代也許是中國歷史上最難研究的朝代之一，儘管元代自元世祖忽必烈到末代皇帝元順帝所統治中國的八十九年並不是很長，但是幅員遼闊，所

21 黃兆強著，《清人元史學探研》（臺北：稻鄉出版社，2000）。

以如果要進行元史研究，比起對其他較小規模的統治時期進行研究，難度比較高。而且因為元史或蒙古史的原始材料是蒙古文，所以研究元史，比較踏實的做法就是要懂蒙古文，如此才能夠研究得比較深入。在這情況下，相對來說很少有人對元史做研究。可是為什麼清代人比如錢大昕會對元史進行研究呢？我覺得錢大昕是一流的史學家，也是一流的學者，他勇於去接受新的挑戰，很有一種克難的、挑戰自我極限的精神。

余英時講過，現在大家都很重視近現代史，因為與目前的生活相關一點。古代史距離我們比較遠，好像古今之間的聯繫不太大。一般來講，近代所發生的事對今天影響比較大，遠古的、古代所發生的事對今天影響比較小。可是常常有例外，譬如說儘管孔子是兩千五百年前的一個人物，但他個人以及儒家所講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這種倫理道德上的標準，對中國影響深遠。所以認為近現代史對今天影響比較大只是就一般的情況來說，個別情況還有其特殊性，並不能一概而論。

漫談各國獲得博士的方式和上課方式

我在巴黎大學學習時，課程並不多，兩到三門左右，但是可以旁聽很多課程。法國非常開放，各個老師在課上的要求都不一樣，一般老師不要求學生考筆試，寫一篇小論文或者報告滿足課堂的需要就足夠了，有的老師可能要求得很多。不過我覺得法國在這方面的制度現在好像是在慢慢地改變。

英國的博士制度則是另外一種情況，完全不用上課，個人能

力好的話，幾年就可以畢業，比如我們系的傅揚²²老師在英國四年就畢業了。其次是學生和老師的關係。如果老師看重你，那麼完成一篇論文就可以畢業了。

美國的博士制度是要上很多課，所以我覺得相比之下，美國的制度對於學生的訓練更好。因為上了很多不同的課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所以學生的程度不會太差。在課程中所寫的小論文可以成為畢業論文的一部分。

總而言之，我覺得美國的制度打根底最好，英國的制度完全是看個人的天分。對於天分很高的學生，美國的制度會使其受到限制，程度很好卻還要上很多的課程浪費時間，從這個角度來看，英國的制度就有它的優點。

有時候我和學生們討論，詢問學生們覺得要不要修史學方法這門課。學生們對此很疑惑，以前的大史學家司馬遷、司馬光根本就沒有上過史學方法這種課，但是完全不影響他們成為大史學家。可是對於學生們來說，又有幾個有這樣的天賦呢？所以對於資質一般或者中等的學生來說，還是要一步一步地來，接受傳統的規範教育。

對於香港的上課方式，我不太清楚，以前還是比較保守的。像中國大陸好像主要是老師講課，學生做口頭報告、發表意見的

22 傅揚，英國劍橋大學東亞系博士。研究領域：中國思想文化史、漢晉唐政治文化、思想史學。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民國106年8月-民國107年7月）任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2018年8月至2020年7月（民國107年8月-民國109年7月）任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專任助理教授，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傅揚〉，來源「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師資介紹」：<http://140.112.142.79/teacher/user-p.asp?teacher=yangfu>。（點閱日期：2020年10月16日）

機會比較少。相對來說，臺灣的上課方式比大陸更加多元化，師生之間的課堂互動很多。比如除了課堂報告外，還有播放投影片、請學生上臺表演、訪問、參訪、去實地田野調查等等。

恩師與學術方向

我念的大學並不是香港最好的大學，所以當時我並沒有把重點放在讀書上，而是放在系學會的工作上，也許我做系學會工作多於我學習的時間。但是我很少翹課，上課用心聽課、做筆記，下課後完成系學會的工作，讀書主要閱讀老師所指定的書目。後來邊教書邊念研究所的時候，才開始發奮讀書，大學四年我讀的書不多，很慚愧。

雖然我念的是歷史專業，但是我對哲學也有些興趣，後來去新亞研究所，那裡有很多大師，歷史專業就是嚴耕望和全漢昇²³。

23 全漢昇，歷史學家、教育家，著名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專家。歷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及該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新亞書院校長、新亞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曾應美國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及日本東洋文庫之邀，擔任訪問學者和研究員。其著作主要有《元代的紙幣》《明末清初反對西洋文化的言論》《中國行會制度史》等。〈全漢昇〉，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全漢昇>。（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哲學專業是牟宗三²⁴和徐復觀²⁵，當時研究所真可說是人才鼎盛。

雖然我念大學時不認真，但念研究所時，有這麼多大師，我再不用功就真的對不住他們。當時研究所是書院制度，書院制度的特點是重視博通，比如我念歷史專業，但同時我還要修文學或哲學課，所以我也修牟老師和徐老師的課，也算受過一些哲學專業的訓練。最近十多年，我主要把研究重點放在現當代新儒家方面，史學這方面沒有太多研究。

我有一個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的朋友叫劉國強²⁶，他知道我

-
- 24 牟宗三，山東栖霞縣人。中國現代學者，哲學家、哲學史家，現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58年與唐君毅、徐復觀、張君勱聯名發表現代新儒家的綱領性文章《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0年去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主要著作有《邏輯曲范》、《理性的理想主義》、《道德的理想主義》等28部。其哲學成就代表了中國傳統哲學在現代發展的新水平，其影響力具有世界水平。〈牟宗三〉，來源「南京大學哲學系官網」：<https://philo.nju.edu.cn/f2/95/c4699a127637/page.htm>。（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 25 徐復觀（1903-1982），致力倡明儒家學說的中國現代學者。1918年赴武昌求學。1926年曾參加國民革命軍第七軍。1928年赴日本留學，先在明治大學學習經濟，後入日本陸軍士官軍校步兵科學習軍事。“九·一八”事變後回國，先後在國民黨軍隊中擔任團長、荊宜師管區司令等職。1942年春曾奉命前往延安任聯絡參謀，歷時半載，與中共領導人多有往來。1946年以少將銜退役，曾在南京主辦《學原》月刊。1949年5月去台灣。同年6月在香港創辦《民主評論》半月刊。1952年任教于台中省立農學院。1955年任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1969年從東海大學退休，次年去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新亞研究所教授兼導師等職。〈徐復觀〉，來源「中國孔子網官網」：http://www.chinakongzi.org/baike/RENWU/JINXIANDAI/201712/t20171221_158005.htm。
- 26 劉國強，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學士、碩士，夏威夷大學博士。任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哲學系榮譽教授，南京師範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山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院及宜賓學院客座教授，尼山聖源書院副院長。

很仰慕唐君毅²⁷先生，在2006年他邀請我去唐君毅先生的出生地四川宜賓辦一個和唐老師相關的講座。當時是我擔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的第二年，比較忙，我就說等我卸任之後再去。他說不行，趁我做院長的時候正好。因為唐老師認為傳統儒家的東西是內聖外王，一方面做學問，另一方面在事業上也要有所表現，所以就去了宜賓學院，講唐老師的人文精神。當時聽的人很多，學生好像有一兩百個人，反響很好。因此我想我是不是應該多花點時間來為唐老師做點事情，發揚光大他的學問。

由於天賦和後天努力等因素的不足，我自問成為研究歷史的大師是不可能的，二流的恐怕也不見得，可是發揚光大老師們的學問還是有點能力的。所以從2006年開始，我主要研究徐、

主要從事儒家哲學、儒道教育思想和道德教育等研究。已出版主要著作有《道德教育須情智雙彰：從美國當代道德教育反思》、《從人生之艱難罪惡之根源說儒家返本開新的道德教育進路》等。〈劉國強〉，來源「尼山聖源書院官網」：<http://www.nssysy.com/a/dstd/2014/0413/766.html>。（點閱日期：2020年10月21日）

- 27 唐君毅，四川宜賓人。中國現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儒學大家，當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1925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後轉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畢業後歷任四川、華西、中央等大學教授，並任無錫新設江南大學教務長。1949年4月，唐君毅遠赴香港，與錢穆、張懷介等創辦新亞書院，並兼任教務長、哲學系主任等職。1958年與徐復觀、牟宗三、張君勱聯名發表現代新儒家的綱領性文章《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受聘為該校首任文學院院長和哲學講座教授，1967年任新亞研究所所長。1974年，以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榮休，繼續任新亞研究所所長，次年任台灣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唐君毅先生一生致力人文精神的重建與發展，其學問體大思精，長于辨析又善于綜攝，馳聘于東西方哲學之中，而歸于中國聖賢義理之學。〈唐君毅〉，來源「現代新儒家官網」：<http://www.fed.cuhk.edu.hk/youngwriter/tang/>。（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唐、牟三位大師的學問、思想。除了教書或出席有關史學的學術會議之外，餘下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做現代新儒家的研究。於2010年出版了《學術與經世：唐君毅的歷史哲學及其終極關懷》一書

工作教學

任教東吳大學歷史學系、任職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其實我並沒有主動申請東吳大學，而是在快要拿到博士學位時，我的學長廖伯源先生在東吳大學歷史系當系主任，他很照顧我，主動問我要不要到東吳大學教書。我快要畢業了，當然很樂意。廖學長的作風是很民主的，當時在臺灣，各大學的系所人事權，基本上是系主任說了算，但廖學長在聘請我之前，開了系務會議進行討論。一晃眼，我在東吳大學待了三十多年。

2004年到2007年這一時期我擔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當時人文社會學院還叫文學院。據記憶，院內的社工系，好像要申請一個計畫，但審查委員認為社工系偏實作，設在文學院底下，不符合實際，就沒有通過該計畫。系主任認為我們改一個更加名副其實的名字是不是更好，於是產生了改名的想法。我們院下設中國文學系、歷史學系、哲學系、政治學系、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音樂學系這七個學系和其他學程。改名主要有兩個方向，要麼改為人文社會學院，要麼改為人文社會科學院。要「科學」還是不要「科學」，老師們各有堅持，一直無法決定，於是我便邀請全學院一百多位老師開會討論。其中爭論的焦點主要是音樂

系。音樂怎麼樣都不能稱為科學，應該算是藝術類，如果能成立藝術學院，那當然很好，但問題是另外成立學院需要增加經費，改學院名稱相對簡單。最後的投票結果是改名為人文社會學院。

擔任錢穆故居執行長

錢穆先生 1990 年去世後，他生前居住的房子便歸臺北市政府管理。政府欲將其發展成錢穆圖書館，後因文化資產保存法的施行，便改為錢穆故居。臺北有很多名人故居包括林語堂故居、張大千故居等都歸臺北市政府管理，但臺北市政府並不親自管理，而是委外給別人經營。當時投標結果是佛光大學贏得了經營權，錢穆故居最開始便交給佛光大學經營、管理。後來由於佛光大學放棄經營，所以政府重新招標，結果是東吳大學得標。最初是一位哲學系的老師擔任執行長，後來那位哲學系的老師離開東吳去別的學校了，就由我來接手當執行長。

我把錢穆先生定位為以史學研究為核心的國學大師。他的學問很廣，但核心還是史學，所以找歷史人管理似乎更合適一點。而且我的老師嚴耕望先生、章群²⁸先生是他的大弟子，所以我便成為了他的再傳弟子。臺北市政府的相關條文規定：負責管理的單位以三年為一屆，可以連做三屆，即最長任期九年。我接管的

28 章群，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香港新亞研究所畢業，中文大學碩士，香港大學博士。曾任香港浸信會學院高級講師兼歷史系主任，並任教於香港大學，專授隋唐史。著有《隋唐史》（三冊）、《中國文化史》（二冊）等專書，其他論著散見於《大陸雜誌》、《新亞學報》及香港大學《東方文化》。來源「聯經出版 - 作家專區」：<https://www.linkingbooks.com.tw/LNB/author/Author.aspx?ID=0000729>。（點閱日期：2020 年 8 月 28 日）

兩年半後剛好東吳大學九年期滿，所以我也就卸任了。

錢穆故居跟東吳實際上是兩碼事，因為錢穆故居的產權歸臺北市政府，而且從門牌號上可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單位。可是外部人一般誤會錢穆故居是東吳大學的一個單位，因為去錢穆故居一定要經過東吳大學的校園馬路，所以一般人會誤以為錢穆故居是東吳的財產，其實完全不是。據悉，錢先生的文物，一部分留在家裡，還有一部分書籍捐給了文化大學。錢穆故居中幾乎沒有錢穆先生的藏書。至於其他物品，譬如日用品，也很少，這大概和師母對東吳有點誤會有關。這個就不細談了。故居臥室中掛有一張畫，是錢先生八十歲的時候師母親自手繪的松鶴圖。當時我擔任錢穆故居的執行長，師母過來我作陪，師母打算將這張松鶴圖拿回去，我就跟錢師母說，盡管我不是錢先生的學生，但錢先生的高足嚴耕望先生是我的老師，作為錢先生的再傳弟子，請師母惠予考量。最後師母便把畫留下來了。

任職期間東吳大學的建築、行政、財政變化

在我任職的三十多年間，東吳大學發生了很多變化。從空間上來看，大的轉變是建築物的增加。我 1987 年剛來東吳大學時，第二教研大樓，還有旁邊的綜合大樓，以及中正圖書館對面的第一教研大樓都沒有建。只有現在的寵惠堂，即行政大樓，以及中正圖書館、音樂館和超庸館等。第二教研大樓是 2008 年才建的。

小的轉變就更多了，包括人事權的轉變。大概二十七八年前，臺灣才開始有所謂的三評三審。三評三審，譬如說聘請一位老師要經過三級教評會，第一級就是系教評會，第二級是院教評

會，第三級是校教評會，都通過了才能夠聘請老師。之前是系主任和校長說了算。當然，如果系主任個人想開放或私底下徵詢老師意見都是完全可以的。然而制度上沒有規定非如此不可。學校就是看系主任的簽呈，再經過院長、校長同意了就算數，不需要通過一個會議做決定。

東吳大學的改變，其實跟整個臺灣的變動是分不開的。據教評會案例顯示，民主的參與成分越來越多。這個就是所謂的教授治校，是得諾貝爾獎的李遠哲²⁹教授提出來的。教授治校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就是共同的事情共同承擔，會比較民主一點。壞處就是很很浪費時間。一言堂可能比較專制，但是某方面來說很有效率，不必經常開會、協調。現在很多時候，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常常耗費很多時間。從民主的方面看，教授治校是民主，可從效率的方面來看，倒不如過去的制度。

人事以外最重要的變動就是經費方面，東吳大學大概每一年所用的經費是二十多億新臺幣。大概六、七年前東吳大學的收支是完全平衡的，甚至有盈餘，但最近幾年由於學生相對地減少，收支也受到了影響。因為我們是私立大學，學雜費為主要經費。其中以學費為主，雜費所占的百分比相對較低。東吳大學大概七八成是靠學生的學雜費，還有兩三成，一部分是教育部給的，

29 李遠哲，1926年生於臺灣省新竹市，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化學科學家。民國83年至95年，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研究方向為多原子自由基與特殊瞬態物種之結構與化學行為；基元化學反應與光分解過程之機理與動態；分子內與分子間能量分佈之本質研究等。李遠哲是第一位出生及成長於臺灣的諾貝爾化學獎得獎者。〈李遠哲〉，來源「中央研究院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https://www.iam.sinica.edu.tw/?link=member&id=1>。（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另一部分是靠捐款、建教合作等。由於大部分還是靠學雜費，所以學生少的話，對東吳及其他私立大學影響都很大。

我之所以給歷史系設立了一個獎學金³⁰，主要是爲了紀念過世的母親的養育之恩。其實沒有多少錢，大概一學期或一學年五千台幣，超過二十年了。當時很少有現職的老師捐贈獎學金給歷史系，好像只有我和何宛倩³¹老師。校友倒是有很多，比如何基丞³²先生。有可能我是開了一個先例，不過也不見得，但是在任的老師爲了紀念某一個人而設立獎學金的真的比較少。何宛倩老師是校友，所以她可以以校友或老師的名義捐贈，而我不是本校畢業的，情況略有不同。

現在看到交換生來到東吳我很高興，不僅對經費方面有幫助，能教導更多的學生也是很快樂的。孟子說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東吳前校長劉源俊先生曾說：我們要改一下孟子這

-
- 30 該獎學金爲東吳大學歷史學系黃曾肖金紀念獎助學金。針對歷史系二至四年級學生，學行表現優異。每年依捐款人捐款時程及金額，提供一名。〈黃曾肖金紀念獎助學金〉，來源「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官網」：<http://web-ch.scu.edu.tw/history/file/7674>。(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 31 何宛倩，東吳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美國肯特大學歷史學碩士。這裡指何宛倩老師爲紀念先母所設立的東吳大學歷史學系何江玉瑕女士清寒學生獎學金。針對歷史系一至四年級，學行表現優異而家境清寒。每學年提供二到五名，每名五千元。〈何江玉瑕女士清寒學生獎學金〉，來源「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官網」：http://web-ch.scu.edu.tw/history/teacher_resume/5234/965。(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 32 何基丞，東吳大學歷史學系69級校友。這裡指他設立的東吳大學歷史學系何基丞學長獎學金。針對歷史系二至四年級學業表現優秀的學生，每學年提供三名，依學業表現排序，第一名一萬元，第二、三名每名五千元。〈何基丞學長獎學金〉，來源「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官網」：<http://web-ch.scu.edu.tw/history/file/7680>。(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個用語，孟子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我們反過來，「教育之而得天下英才」。先把他教育好，把他轉變成為英才，難道不是更有意義，更有成就感嗎？這一改，我覺得蠻好，教育就本該如此。因為不見得有很多英才給你教，反過來能將一般學生教導成英才，會更有成就感和意義。

任職期間東吳大學的校地問題

校門右手邊有一排民舍，這些民舍的地主不願意賣地給東吳大學，所以東吳大學沒法擁有這些土地。

真正屬於東吳的校地不多，雖然實際土地面積不大，可產權歸臺北市政府、農夫、東吳大學等多方所有，其實我也不太瞭解。當時東吳在法律上並沒有辦好過戶手續，導致後來很麻煩。幸好之後我們有建教合作的構想，即臺北市政府的地雖然產權不變，使用權交給東吳大學，東吳大學象徵性地給一點點錢作為租借費。

臨近退休

臺灣基本是 65 歲就退休，可東吳有點不一樣，東吳分舊制和新制。舊制是 1982 年以前（民國 71 年）來東吳大學教書可以直接到七十歲退休。新制是 1982 年之後來東吳，65 歲就要退休。如果表現優秀，並且還想繼續工作，可以每年通過被推薦的方式留下來，但需要通過系教評、院教評、校教評（三級會議）的審查，下一年方可繼續工作。我今年（2019 年，民國 108 年）68 歲打算退休，系上已經推薦我三年了。其實，按制度我還可以再被推薦兩年，但現在體力大不如前，所以婉拒系主任的再推

薦。另外很多博士「流浪街頭」，應該把機會讓給年輕人。高校崗位早已飽和，博士畢業三年之內找到工作算不錯了，五年是常有，十年也不稀奇。申請來東吳任教的博士很多，我們需要開會面試，考察教學水準，如吐字不清，性格內向的問題。我的一個前輩曾說過，教書千萬不能是「三板」——即只看天花板、地板、黑板。有些人可能研究真的很好，但教書會很緊張，不敢面對學生。說到我，我教書爲什麼那麼累呢，因爲我上課基本都是站著，感覺坐下來好像和同學有距離；另外，我講課也不用麥克風，所以就容易累。

對歷史系和學生的寄語

我對歷史系有很大期許，希望東吳歷史系作爲兩岸交流的媒介，繼續發揚光大。儘管現在經營困難，尤其在招生方面，但系裡前後幾位主任都爲歷史系做出很多貢獻。比如之前盧令北³³主任籌畫開設專班，大陸的學生以專班的形式在東吳上課。楊俊峰³⁴主任上任之後也一心爲歷史系打拚，開設實作性的科目；讓

33 盧令北，美國奧本大學歷史學博士。專長領域：美國南方史、非裔美國人史、美國分離運動、美國內戰、美國歷史。2016年8月至2019年7月（民國105年8月-108年7月）任東吳大學歷史系主任。〈盧令北〉，來源「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專任教師」：http://web-ch.scu.edu.tw/history/teacher_resume/5234。（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34 楊俊峰，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專長領域：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國中古社會文化史、唐宋祠祀信仰。2019年8月1日（民國108年8月1日）至今任東吳大學歷史系主任。〈楊俊峰〉，來源「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專任教師」：http://web-ch.scu.edu.tw/history/teacher_resume/5234。（點閱日期：2020年8月28日）

同學們去中研院訪問王明珂³⁵ 院士、邢義田³⁶ 院士；更爲陶晉生³⁷ 老師成立研究講座；還一直積極推動史蹟考察。

東吳大學的學生比較活潑，頭腦靈活，大陸的學生用功程度和好學態度更勝一籌。所以，我常常強調兩岸交流，交流首先是互相刺激對方，見賢思齊，互相吸收對方所長，就是雙贏。作爲老師，我心裡也有這種期許。大陸的學生蠻有根柢，如果把東吳大學學生的活潑精神吸收進去，應該有所幫助。交流真的很重要，可以幫助我們開拓視野，瞭解當地的文化、習俗等。我之前在法國留學，一開始很不習慣，因爲香港是現代化大都市，很先進，生活節奏快，效率高，而巴黎生活慢吞吞的，和香港完全不同。法國當時還是支票付款，香港很早就用信用卡了。還有我之前在法國買信封（郵柬），要買 10 個，他們不讓我買這麼多。我

-
- 35 王明珂，生於臺灣高雄縣，籍貫湖北武昌，歷史學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專精於中國遊牧民族史以及歷史人類學。2014 年當選爲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明珂〉，來源「中央研究院」<http://saturn.ihp.sinica.edu.tw/~hanchi/homepage/people/people1/3-7.htm>。（點閱日期：2020 年 8 月 28 日）
- 36 邢義田，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爲秦漢史。〈邢義田〉，來源「中央研究院」：<http://saturn.ihp.sinica.edu.tw/~hanchi/homepage/people/people1/1-6.htm>。（點閱日期：2020 年 8 月 28 日）
- 37 陶晉生：歷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專攻宋遼金元史。爲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歷史系博士。曾任台大歷史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美國亞曆桑那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現任中研院史語所通信研究員、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曾主持《食貨月刊》、《新史學》等歷史雜誌。〈陶晉生〉，來源「中央研究院」：<https://academicians.sinica.edu.tw/index.php?r=academician-n%2Fshow&id=31>。（點閱日期：2020 年 8 月 28 日）

心想：我給你們做生意的機會，還不願意賣給我，真是奇怪。我之後反思到，因為香港面積小，生活很便利，但對於法國的小城市來說，他們沒有那麼多供應品，如果我一個人買很多的話，便會影響其他有需要的人購買。所以開拓視野還是很有必要的，慢慢地會從對方立場看問題，不完全從既有的、先入為主的觀點出發。